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④

■刘清志

长城瞭望 中国新闻名专栏

“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廉与贪之分古已有之。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保持清正廉洁，有的人却成为腐败分子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所处的从政环境存在差异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习主席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这一重要指示要求，对于持续用廉洁文化滋养兵心、激励军心，从灵魂深处、点滴之处提高官兵的品格修养和廉洁素养，形成“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新风正气，营造崇清尚廉、拒腐防变的浓厚氛围，凝聚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廉洁与腐败，既是从政行为，又是文化现象。一个地方的廉政生态，体现着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总体面貌，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和从政取向。廉政环境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延安时期，党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创造了政治清明的崭新局面。毛泽东同志用“十个没有”来描绘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环境，其中“没有贪官污吏”排在第一位。“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唱出了人民群众的由衷赞誉，我们党也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上安下顺，弊绝风清。”人在心理上大都具有从众性、随他性，周围的多数人怎么说、怎样做，对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军地查办的腐败案件看，凡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地方，大多是廉政文化建设薄弱、崇廉拒腐风尚弱化的地方。试想，如果一个地方多数人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行为准则，认为民求官办事者花钱理所应当，官为民办事者收钱合情合理，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浊者自浊，清者难以自清，腐败现象能不滋生蔓延吗？

军队是要打仗的，部队建设中的任何一点腐败行为，都会直接影响战斗力生成。腐败问题在党内不能存身，尤其在军队不能存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分子就没有藏身之地，人民军队军心士气就能实现大凝聚，传统本色实现大回归，威信形象实现大重塑，打赢能力实现大跃升。“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如果“大环境”不好，多数人对于腐败现象见怪不怪，最终必将污染生态、萎靡思想、消沉意志、干涸心灵。如此这般，严重偏离我军性质、宗旨和本色，能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

“以德润身，以文化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离不开廉洁文化的熏陶和廉洁理念的引领。有什么样的廉洁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就会有什么样的廉政风尚。廉洁理念不会自动生成，也不会凭空产生。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真正使廉洁理念在广大党员干部和官兵中入耳、入脑、入心，生根、开花、结果，才能营造出廉荣贪耻的浓厚氛围，让腐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立定标杆，则有思齐者；筑就高地，可引守望者。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一个廉洁典型就是一面旗帜，可以引领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的良好风尚。“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和他的《清贫》，激励教育无数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无畏前行。“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充分挖掘和发挥廉洁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入宣传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李素芝、杨业功等模范勤政廉政、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可以让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增强崇廉拒腐的内动力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同时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每一名党员干部和官兵都要把净化廉政环境当成自己的事，克服与己无关、无所作为的“鸵鸟心态”，不当旁观者，争当参与者。只要大家都来动手、都来耕耘，自觉去践行、去呵护，做崇廉拒腐良好风尚的营造者、引领者，就一定能够形成纯洁健康、风清气正的廉洁生态。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谈训论战

『基础功』不是『无用功』

■董强 王梓旭

新年度军事训练展开后，某部没有急于上高难课目，而是认真抓好部队技战术基础训练。此举看似做了“无用功”，实则是进一步夯实训练基础，为提升部队整体作战水平提供坚实的能力保障。

“无用功”一词，常常与“没意义”“效率低”“浪费时间”画等号。但在物理学上，“无用功”却是指“并非需要却不得不做的功”。对于练兵备战而言，也有很多一时难以见效却十分必要的工作，需要官兵耐心细致地去完成。

“有用者，其用有尽，无用之用，其用无穷，故能成为大用。”练兵备战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泛、牵动部门众多、工程程序繁杂。有些工作看得见、摸得着、时间短、见效快，而有些则是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却暂时看不出效果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对此，一些官兵时常以见效快慢论英雄，把“有用功”等同于“见效快”，而将“打基础”视为“无用功”。殊不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那些“十年磨一剑”的工作，可能对提高实战能力发挥不出立竿见影的功效，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夯实训练基础、提升训练层次的重要保障。

“刻画工夫初亦苦，终然芒角了无痕。”部队是要打仗的，各项建设都必须向提高战斗力聚焦用力。判定“有用”与“无用”的标准，就是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只有时刻校准这样的坐标系，才会主动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扑下身子、静下心来，下一番打基础、利长远、管根本的“慢功夫”。

胜战先胜于练兵，练兵首成于基础。基础训练是一切军事训练活动的根基，往往不显山不露水。比如耐力、爆发力、速度的提升，只有通过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不下苦功打基础，练兵备战就会像在泥塘里跳高，越使劲陷得越深。“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千锤百炼、长期磨砺，方能练出强悍的体能、精湛的技能。

理论是一切训练实践的基础。科学的军事理论也是战斗力。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个别官兵对“练兵备战、理论先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学理论是“无用功”，不如到练兵场上摸爬滚打、实打实投来得痛快。岂不知，磨刀不误砍柴工，坚持从理论入手，把基础知识弄明白，把训练要求搞清楚，把战术原理悟透彻，才能快速提高训练水平。不从理论上打牢基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军事训练就很难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古人讲：功不唐捐。风物长宜放眼量，无用之用有大用。说到底，如何对待基础训练，体现的是智慧，考验的是担当。虽然当前军事斗争准备形势严峻，实战化训练任务繁重，但打基础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立下“坐冷板凳”的志向、甘做“地平线下”的工作，日日为继、久久为功，练兵备战的基石就一定会更加坚实稳固。

政治上不能产生“钝感力”

■邵长华

画里有话

《钝感力》一书中写道：“对坏的事情不耿耿于怀，能迅速忘记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这种心灵上的正面钝感力，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这里的“钝感力”，可直译为“迟钝的力量”，即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就人生智慧而言，钝感确实比过分敏感要强。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政治上不能产生“钝感力”。如果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见事迟、反应慢，对错误言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甚至给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思想言论提供平台讲台，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和斗争精神，是要犯政治性错误，产生严重后果的。

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在人的感官中，嗅觉比较敏锐。有些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嗅出不同寻常的味道。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见微知著、明察秋毫，这是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

政治上敏锐，就是对政治问题思想敏感，眼光锐利，能时时处处从政治上看问题、想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只要具有了政治敏锐性，即便在“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状况混沌、性质不清、趋势不明，也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进而洞察先机、趋利避害。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拉锯一刻也没有停歇。而且，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各种与主流价值相悖的“杂音”，经过网络加工、信息包装，鱼目混珠、乱象丛生，极具隐蔽性、迷惑性、欺骗性。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对于潜在的政治风险，我们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科学预判、未雨绸缪，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对事关道路方向、战略全局、前途命运等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善于主动拿起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进行观察和认知。无论什么时候，决不能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决不能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决不能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决不能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真正做到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作者：周 洁

长城论坛 中国新闻名专栏

突出学好“最近的学问”

■张永翀 张兆生

当年，周恩来同志在日本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种达观求变、与时俱进的学风和作风，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早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共产党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

理论源于实践，而实践是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每个时代发展的诸多基本特征，在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是没有的。这要求科学的理论需要不断发展，“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充分说明：唯有不断发展的理论才称得上科学，才有影响力和吸引力，才有说服力和战斗力。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对于共产党人而言，突出学好“最近的学问”，就是要突出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为，发展的实践呼唤着发展的理论，发展的实践也孕育着发展的理论。同时，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时期的理论都具有相对性。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才能在变化的节律中不失方寸。这既是时代与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属性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深心实”铸就思想武器，“学思践”汇聚强军意志，“知信行”强固政治灵魂，全军官兵就有了最可宝贵的政治滋养和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信心、有力量。

牢记“权”字的本义

■岳 伦

玉渊潭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前夕，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播出，受到广泛关注。

古人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而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一位大学教授谈道：“从文学角度讲，‘权’这个字本身是很好的。”他解释说，“权”字的繁体字“權”，由“木”旁和“雚”字组成。“木”象征手握权杖的人，“雚”象征鸟嘴的形状，两者结合起来的含义，就是指领导者像鸟嘴一样自上而下地劝说、影响他人。

简而言之，“权”字的本义，就是自上而下的影响。如果把影响分开来看，影，可以理解为形象、作风；响，可以理解为追随、响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影响，关键在“影”。有什么样的“影”，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响”。从古至今，“影”正“响”从，则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影”不正“响”不从，则人心涣散、百弊丛生，什么事都难以干成。

自上而下，关键在于“上”。自然界把大气从高气压处向低气压处的移动定义为风。将廉政之风从上往下的渲染和传递，正是“权”字的应有之义。“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人先正己，达人先达己”……这些至理名言都启示和警示我们，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关键少数”只有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作风正派、形象良好，才能产生好影响、传递正能量、带动大多数。

“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是中国传统从政美德，历代明君贤臣更是将此作为从政之要、为官之本，老百姓也把它作为评判官员德行的重要标准。人们耳熟能详的“铁面无私廉明断案”狄仁杰、“黑脸青天”包拯、“两袖清风”于谦、“直言天下第一疏”海瑞、“清官第一”于成龙等，都是人们心目中清官的典范。这些清官因为廉洁，不仅在当时带动形成了良好风气，而且流芳千古，被后世广为传颂。

“权”字只有六画，写起来容易，用好却不易。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只是一种工具，用它为善还是为恶，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很多时候，权力带来的后果恶如霄壤，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幸福与悲哀，实则只有一步之遥——“只在公私之间尔”。如果它为公的时候，它是向利民的方向转化，但它为私的时候，一下子就向反方向转化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牢记“权”字的本义，就要弄清权力的“源头”。领导干部唯有清楚地知道权力从何处来，才能明白权力当用到何处去。战争时期，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同志：“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他回答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党组织托付的，只有拿来为民服务，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的女儿曾问他：“爸爸，你是拿口镇最大的人吗？”他回答：“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每一位领导干部也应时常问一问内心：手中的权力到底用给了谁？同时还要想清楚一件事：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被党和人民收回，自己也将万劫不复。

“世间百态人情暖，万般滋味在心头。”牢记“权”字的本义，就要勿忘权力的“原味”。权力是有滋味的。在有的人眼中，权力是甜的，意味着金钱和地位。而在共产党人眼中，权力意味着责任担当、信任托付。信念不同，滋味各异。想升官发财，难免一手铜臭味；一心为民干事，自然一身清廉气。

焦裕禄立下“苦战三年驱走三害”的军令状，对他而言，权力就是“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本味；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对他而言，权力就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真味。不管权力味道几何，关键是要弄清怎样敬畏权力、行使权力，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改变信仰的原味、初心的本味。

“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新时代新征程上，各种诱惑考验无时不在，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常治其身、常思不足，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引领感召“绝大多数”廉洁奉公、锐意进取，朝着强国强军目标砥砺前行。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李相葳 姬 童

开国上将彭绍辉，1932年起就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师长，1935年又奉命调回红三军团。彭德怀同志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战争年代，部队经常整编，连降数级使用的干部不在少数，大家的态度都很明确：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党章中多次出现“服从”二字。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就去哪，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党性原则，映照着我党我军“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优良传统。胜利时、顺境中，日常工作分配、一般考验面前，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听党话、跟党走，听招呼、守规矩。但是，困难时、逆境中，尤其是面对大事难事、危机考验，甚至牵涉重大利益、关乎前途命运时，个别同志就可能患得患失、讨价还价，打折扣、搞变通。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风吹浪打，生死抉择，至暗时刻，能否做到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党性觉悟、政治原则和思想作风。1934年，因肃反扩大化，红25军300余人被认定有问题，可这些官兵硬是干伙夫、当挑夫一直跟着队伍长征。平反后，很多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组织发给我一支枪，让我上战场！无条件相信组织、服从安排，彰显的是共产党人清醒的党员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部队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平时经常要转换任务、调整岗位，战时随时要闻令而动、冲锋陷阵，“组织的安排”就是党旗所指、军旗所向。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不仅要做到“祖国要我守边卡，石头缝里把根扎”，更要敢于“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只有把“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忠诚基因融入血脉、注入灵魂，烙印于心、见之于行，才能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经受住苦与难的检验，经得起血与火的考验。